

2月27日上午，我连续接到几位友人发来的微信，告知：上海著名出版人郑宗培先生走了。与郑兄同庚的我，知晓“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的涵义，更何况此辈数回与亲属着友生死离别，已无法再去感叹什么了。但，上海出版界著名出版人，我的郑兄的突然离去，却在我本如止水的心池激起阵阵涟漪，刻骨而铭心。

我知道郑兄十余年前曾患重疾，去年又因病住院，期间我曾探望他数次，并常在微信中问候他，应该说我对郑兄的病况发展有一定的思想准备。然那天上午得到郑兄走了的噩耗后，还是给我晴天霹雳的震撼。我不愿相信，这么好的一位兄弟就这么悄然地离我而去了！

今年元旦后郑兄托人给我送来一条黑色的花丝巾，并附上一张由他签名致谢的便条纸。一位七尺须眉给我这个一介武夫送一条黑花丝巾，我当时就预感到郑兄是在向我传达某种不能言传只能意会的信息，心里暗佩郑兄：您在病中情感纠结之时，还将与友人的交往交流弄得如此含蓄、如此雅趣。郑兄如此之举，与其说是赠礼于弟，还不如说是郑兄在安抚我的牵挂和不安。他把病痛的折磨和预感的不祥独自扛着，体现了一个智者的理智从容。为此，我在1月17日即在微信群中发了一条“挚友赠丝巾，礼轻情悠长”的帖子。在斟酌此帖语时，我有意不用“礼轻情义重”的俗语，而用“礼轻情悠长”。“悠长”

是何意？就是郑兄与我交往几十年是“长”，我与郑兄还要永远长久维系这兄弟之情。1月17日到2月27日，40天我们兄弟就阴阳两隔，当时我在微信帖中说我要将郑兄赠予我的这份礼品珍藏于箱，珍藏于心，睹物思友，友已远去，但我会将他赠送我的这方丝巾和他一道珍藏我心。

郑宗培先生是一位知青出身的文化人。他是上海出版界乃至全国出版界颇有威望、成就斐然的文学编辑和出版人。郑兄曾先后担任过文学编辑、文学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副社长等职；还担任过《小说界》《艺术世界》《东方剑》主编等职。但郑兄最有成就，且最令我可夸耀的是他在出版界为上海这座魔都文化城所作出的骄人业绩。

说到郑兄在出版界的成就不能不说到中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的两位大咖：易中天和莫言。易中天是一位既会著书立说，又会引领风潮的文化学者。在中国文坛的影响如日中天，其中最成功的合作者和推手就是郑宗培这位上海出版人。在易中天的《品三国》央视拍卖会上，郑兄以过人的胆略和敏锐的慧眼拍得了该书的出版权。随后，上海文艺出版社以五百多万册的《品三国》发行量，创造了中国出版市场的奇迹。如此天量的发行数还让《品三国》一时洛阳纸贵，易中天烧旺了中国书市。中国首位诺贝尔

文学奖得主莫言，和郑兄的联手合作并不是在莫言成名后，而是在莫言还是一名乡土作者、一名军旅作者时，郑兄就以文化战略家的眼光和文学掘矿人的战术，进入到莫言的文学事业。郑兄对莫言的文学作品没有门户之见，最早将莫言的文学作品引进都市文学殿堂，莫言的

郑宗培：南人北相 心细如丝

□ 冯世荣

得意之作《蛙》经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当年就获得“茅盾文学奖”，也为莫言进军诺贝尔文学殿堂作了铺垫。郑兄在与这些文化名人的交往中，体现出了中国当代出版人的特质，就是文品开道，人品作底，产品回报。

说到郑兄不能不说到他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对上海公安文学事业的厚爱，以及对我本人从事公安文化工作的支持和提携。1984年，郑兄和当时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孙颉（后担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等文化人登门上海市公安局，向公安高层提议，由他们与警方合办一本法制文学期刊，也就是在郑兄他们的倡议推动下，上海市公安局于1985年正式创办了《剑与盾》法制文学期刊。在《剑与盾》和后来的《东方剑》办刊过程中，郑兄和他的同仁们不当甩手掌柜，不发号施令，而是手把手地教公安办刊人如何写稿、如何组稿编辑。郑兄他们

参与了公安办刊的全过程，他们和我们一起分享公安文学成功的喜悦，也与我们一起分担了公安文学发展经历的曲折和坎坷。郑兄与我们上海公安文化人是真正的同呼吸、共命运。在公安办刊的过程中，有一次我们遇到困境，当时我找到郑兄，与他商讨刊物面临的挑战时，郑兄再一次向我们敞开了温暖的怀抱，以他特有的智慧和热情与我一起协调各方，使刊物以特有的方式生存了下来。如今二十六年过去了，《东方剑》这本法制文学刊物依然在顽强地生长壮大，还被国家新闻出版总局评为“双效期刊”。在我十数年的公安文化工作中，每当遇到困难感事，我总会第一时间想到郑兄及他们的上海文艺出版社，我甚至感到，上海公安是我立身履职的地方，而上海文艺出版社犹如我的娘家，郑兄他们就是我的娘家兄弟，这是我至今不变、终身难忘的深切感受。

莫言先生在评点郑兄时用了一句文学语言：南人北相，心细如丝。在与郑兄交往的几十年时光里，我对郑兄的评价可谓是与莫言大师英雄所见略同。郑兄是上海人，是莫言定位的“南人”，从外表看，郑兄壮实的身板，圆润的脸庞常挂笑容，一头微卷的头发从不打理，说话语气爽朗而不故作，说话办事、待人接物毫无城府，不会搪塞。这相貌脾性大概就是莫言所说

“北相”。对莫言后面一句四字“心细如丝”，我更是感触颇深。

一次，我随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杨益萍社长赴英法参加国际书展，杨社长刚从其他部门到上海文艺出版总社任职，郑兄怕杨与我不熟悉，行前特意关照杨社长出访途中要多关照我，并硬塞我一点出访途中需要的物品。我当时就有在家外出时家中大哥对兄弟的那种温暖感。在国外考察途中，杨社长与我谈到郑兄对我的关照，就说郑兄与我的情分不输他们文艺出版社。在十数年的工作交往中，我去上海文艺出版社联系工作，只要进入绍兴路7号大门，从传达室到郑兄办公室外间的员工，从未挡道查问。他们说郑兄总关照过：公安局老冯来出版社让他直接到4楼办公室，不需登记。绍兴路7号底楼大厅是上海文艺出版社读者服务部，有各种图书出售。郑兄关照服务部的营业员，凡是老冯他们公安书刊社的人员来看书要照顾好，需要购书享受员工折扣。还有，以前每年到上海文艺出版社春节联欢活动时，郑兄都提醒主办人员不要忘记通知老冯他们。我对郑兄的为人点点滴滴都铭记在心。我涂鸦此文斟酌起文章标题，思来想去还是莫言说出了郑兄的形和神，说出了郑兄的人 and 心。我借用莫言大师的八个字也是表达了我对郑兄的肺腑之言。

愿郑兄一路走好，来世我们再做兄弟！

昨夜情，今朝思，是啥精神？找回他的师生情。一个从小“调皮捣蛋”的65届学生，想不到55年后的一天下午，还会寻找我家，与我紧紧握手。

昨夜情

□ 姚琳勇

“姚老师好！我来看看你。”“谢谢，小陶。”“不用谢，老师传授知识给我们，我们应当感恩老师。”

这个学生已退休，面型变化不大，穿着黑色西装，略微富态。我一眼认出。他见我仍像当初那样，记性好，思路清晰，挺开心。进屋坐下闲谈中，知道我退休后喜欢拉拉二胡，小陶爽快，次日就约他同学——原上海交响乐团退休的小唐，带了二胡骑车专程来，陪我一起拉拉二胡。在客厅里，我先拉了《喜洋洋》曲，小唐听了后说：

“嗯！基本功还可以嘛。”“不！不！”

因我心里明白，是学生对我的尊重。果然，小唐很真诚，把他每天练的基本功曲，写在纸上递给我，并由他示范拉了几遍，我跟着拉，直至音准，他才放心。接着，他也拉起《喜洋洋》曲。此时，我妻微笑着正端着热茶和水果从厨房出来，边招待边坐下，她满含欣赏之情，连连赞道：

“好听！好听！”

“当然啰！毕竟是受过专业培训的！”我从心底佩服地脱口而出。

后来，小陶见我们拉得很欢，便也按捺不住性子，拿起二胡，拉起《良宵》一曲，尽管曲子被拉的有点支离破碎，但是，那是我喜欢听的曲子，却让我们好开心，都哈哈地笑了起来……

那天，我兴奋得夜不眠，小陶叫小唐送经上门，让我触摸到了“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

瞬间，小陶转变的故事在我脑

海油然而生。55年前的3月5日，学校开展的学雷锋活动，正红红火火的进行着。那时我是初一（2）班班主任，一直跟班到初三毕业。小陶学习成绩中上，但是骂人闹事、小捣蛋、给老师起绰号，样样都来，是全校有名的“刺二头”。班主任会上初评他的品德为丙，联评时我建议改为乙。当时老师就讽刺地问我：

“他背后给你起绰，骂你，你知道否？”“知道，但我要说一件大家可能不知道的事。”我坦然回答。“啥事？说来听听。”主持会议的宁校长问。

“在学雷锋活动中，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经常看到小陶守候在一号桥，帮助菜农推车上桥，风雨无阻，他一手撑伞一手在后用力推着。我问小陶，你为啥这么做？他回答，是毛主席号召学雷锋做好事。我一把抱住他，热泪盈眶……我嘴里夸他，好样的！好样的！”在联评会上，我讲了这些。

宁校长首先说：

“没说的，这样的学生品德不能为‘丙’。”

我再问大家，没人说话，只给了一片鼓掌。毕业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没有想到直到55年后，小陶竟然找上了门，69岁的他，坐在78岁的我身边，心意满足。那美好的师生情，就如一缕芳香，把我引向清新的世界。

■ 撸起袖子加油干（篆刻）相海勇

■ 本版摄影 祖忠人

■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焦晃

■ 上海京剧院 尚长荣

■ 上海音乐学院 廖昌永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诗歌朗诵会献演北京



■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焦晃



■ 上海京剧院 尚长荣



■ 上海音乐学院 廖昌永

在鲁迅公园翻阅历史

□ 杨瑞福

到一个公园里去翻阅历史，不仅需要眼睛，更需要用自己的内心。这是我和在公园树梢不懈唱着情歌的鸟雀，差异最大的地方。

在松柏和香樟成荫的鲁迅公园里，千万别只读懂了鲁迅的外貌，包括高耸的前额以及那一对浓眉——那是从万国公墓迁来之后，特意在新墓前放置的半身铜像。

说一声尊敬和崇拜是容易的，精神却如此难以效仿。当一支毛笔可以化为投枪，夹在信封里寄回的，必然是致命的子弹。

鲁迅先生走得很安详，当年送别的时候，据说万人空巷。

他还是走得太早了一些，既看不到从朋友的阵营里，向他背脊所发射的冷箭；更看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老舍先生在写完《龙须沟》之后，竟然会自沉在挚爱家乡的湖底。

如果鲁迅先生活到了今天，他会继续写尖锐的杂文，还是去写脍炙人口的小说，或是写一些专供回忆的散文？

这个悬念，是我解不开的死结。

二

把原先的“虹口公园”改为“鲁迅公园”，本意也许很好。这是在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我们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别忘了身边长眠着上个世纪的一位伟人。

鲁迅先生可能不会这样想。他也许更愿意让自己的魂，空闲的时候再走一走不远的山阴路、四川北路、甜爱路，这些路没有因为他从前走过而改名。

与公园只隔几步路的地方，是鲁迅先生在上海的故居。红砖、红瓦的三层小楼房，此后八十年的风雨，竟然没有摧毁或腐蚀它活着的意志。

与过分喧闹的园区相比，楼房外攀援的爬山虎，已经习惯了人去楼空的场景。

标有大陆新村9号门牌的房间里，许多发黄手稿依然还在倔强

地呼吸，但只是心灵相通的人才能觉察。

鲁迅先生好像还在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因为他们听得见彼此的声音。所钟爱的木刻板画还在，珂勒惠支的署名仿佛墨迹未干。为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的整理，还尚未完成。

先生遗憾地说过：“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笔放下了，就不再举起。

天堂没有出版社。

三

我也许有些自私，因为出生地的缘故，更愿意让公园牢记它原来的姓名——虹口。

不是所有的记忆都可用作为珍贵的史料，虹口公园一定例外。从1905年的建成开放，它曾有的乳名“新靶子场公园”，我很陌生。

1932年前的4月，人们没有沉醉于莺飞草长，而听见了震动世界的爆炸之声。

那是向侵略者的宣战之声，那是不甘被奴役的民族，胸腔里发出的最初吼声。

来自朝鲜的抗日义士尹奉吉，向正在公园里的主席台上端坐的日本高官们，投去了炸弹。

占领军司令白川、日本侨民居留团团长河端、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驻沪领事村井、占领军军舰队长野村、师团长植田纷纷倒在了血泊之中。

一场大型战役，都难以消灭这么多位高权重的侵略者，手无寸铁的虹口公园做到了。

即使在1937年上海沦陷之后，日本侨民暂时占据的时刻，忍辱负重的公园啊，它比上海的任何一座公园都清楚记得，必定有回归人民怀抱的那一天。

我佩服它以始终不渝的爱憎，为自己亲笔写下的篇章。

每个诅咒战争并呼唤和平的人，别忘了在这座公园的“梅亭”之前默哀肃立，为了这一次以生命为代价的抗争，也为了不再叹息几十万生灵，在高举白旗时的屠杀！

桂花苑

刊头书法 朱玉琪

■ 撸起袖子加油干（篆刻）相海勇

■ 本版摄影 祖忠人